

戰後西德正式建軍前軍人的處境與掙扎 (1945-1949)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授 傅寶真

◆ 提 要

- 一、德國在戰爭結束後的最初幾年，情況是非常悲慘，特別是軍人的處境。他們忍受國家的戰敗，擔負助長過去納粹向外侵略的罪名，有些遭受戰勝國及國際軍事戰犯法庭審判與定罪，也有被拘為俘虜，遲遲未能釋放。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政府與軍事組織遭到解體，生活頓失依靠與申訴管道斷絕，以及整個國家被占領與執行非納粹化及非軍事化之政策，幸好靠這些軍人，尤其是將軍的經驗與技能漸被主要的西方戰勝國所重視。再加以不久冷戰開始及美、蘇兩大超強對立，使德國在歐洲的地位日漸重要。東、西德在兩大勢力的範圍內各自組成政府，軍人逐漸被利用發揮專業或專長，尤以西德與西方盟國利用過去軍人，在1949年後漸以新瓶裝舊酒的方式，與舊勢力合作，共同防衛歐洲的安全與自由。此一階段（1945～1949）尚在奠定鋪路的基礎。
- 二、戰爭的勝利給他們帶來榮譽，但失敗則是痛苦與深思或教訓。第二次大戰德國又徹底地戰敗，且由於戰後的國際情勢，不可能再有復仇戰爭，於是軍人痛定思痛，與民主政府人士及過去敵國合作，致力於區域安全與國際和平的目標。1949年前正是這段思考與觀察階段。

前 言

德國軍隊在1954年5月無條件投降時，這支有數百年歷史紀錄與傳統的武力，看起來似乎將永遠沉入人類舞臺演進的灰燼中。隨著它的戰敗，不但要卸

下全部的武裝，而且有甚多與納粹向外侵略與犯下暴行有關連的軍人都將會接受軍法的審判與定罪；軍官團停止運作；陸軍參謀本部也遭到解體。同時，整個國家被戰勝國分區占領，且執行非納粹化與非軍事化，使其永

遠不可能再有戰鬥精神或發動戰爭的力量。軍人在此種環境下感受最深，他們不但要承受發動戰爭的罪名，有些被列為戰犯，另有被關入俘虜營，遲遲未能釋放，而且沒有了自己的政府與軍事組織，許多的權益都無法申訴。但普魯士軍隊的優良傳統與高效率的戰鬥力一向為許多國家所重視與極欲仿效之對象。此時正值冷戰剛剛開始，西方盟國與蘇俄所領導的共產集團之衝突及對立日漸明顯。德國軍人的經驗與技能，尤以對付其東方的敵人——俄國，為美國駐德軍事當局所希望爭取與利用。故在此段期間，德國將軍漸受到重視。同時，在英、美與法三國占領區內於1949年所成立西德政府也希望有自己的防禦觀念及利用前軍人組成防禦，甚至維護歐洲的安全與自由，德國軍人開始在戰後重新開始發揮力量。

德軍在戰爭期間與結束時面對納粹化的處境

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後所組成的國防軍（Reichswehr），由於在色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領導下，堅持立場與原則，雖也遭遇甚多的困難，

卻與政治與政黨保持一定的距離，故軍隊與軍人之品質不致會降低^①。但到共和末期情勢卻有變化，軍隊感到自身的實力有限，不足以單獨擔當防衛之重任，傾向與納粹黨之衝鋒隊（SA或Sturmsabteilung）合作或甚至縱容其存在，以致後者之實力大增，終至協助納粹黨執政，但稍後衝鋒隊還是威脅到陸軍與希特勒本身。後兩者又達成諒解，消滅前者之首腦人物羅姆（Ernst Rhoem）及其重要助手與周邊關連人士（由希氏貼身衛隊SS，後來亦稱為黑衫軍，Schutzstaffel執行）。等到納粹黨權力鞏固後，步步向陸軍侵蝕，後者已無力反抗，再加以部分將領討好希特勒，甚至認為其重整軍備計畫在面對西方國家壓力下，使德國強大，為軍人提供較好的出路。到了1938年初，希氏親兼國防部長，可以說完全達到控制陸軍的目的^②。

戰爭初期的輕易勝利，更使希特勒贏得軍心，在軍中的地位更加穩固，沒有人敢不執行其命令及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同時前者亦會巧妙地賄賂將帥與拉攏軍心，手段是以金錢與陞遷^③。例如在第一次大戰德軍編制達最高峰時，總

註①：傅寶真，《希特勒與德國將帥間之關係及其共同主導的戰爭》（臺北：臺灣民生，民國91年）；Jame C. Corum, The Roots of Blitzkrieg: Hans von Seeckt and German Military Reform. (Lawrence, KS, Univ. of Kansas Press, 1992), p.122.

註②：同註①。

註③：同註①，pp.25-26。Norman L. W. Goda, "Black Marks: Hitler's Bribery of his Senior Officer during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72 (2000), pp.413-415. Gerd R. Ueberschaer und Winfried Vogel, Dienen und Verdienen, Hitlers Geschenke an Seine Eliten (Frankfurt/Main, 1999), pp.101-110, 243-247.

共有2,670位陸軍將軍與137位海軍將軍，但在納粹時代則有近4,000位，而且兩次大戰中元帥數目的比例更是任何時期或在任何國家無法相比擬。一次大戰時僅有數位；二次大戰時則有數十位陸軍元帥^④。這種晉陞與賞識的方式使很多將軍感激納粹黨與元首本人，也使其意識形態與教條更容易在軍中流傳。故有些將領執行希特勒的不人道或違背國際公約的命令，如屠殺猶太人及俄國戰俘與軍隊政委就不會感到過分驚奇^⑤。

總軍官團最高層的道德衰落也產生了另外一種現象。由於擴大將軍之陣營，就訓練而言，使其職業品質的專業精神漸有下滑的趨勢，尤以對參謀本部的發展有極嚴重的影響。整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軍隊指揮官之將軍都選自總參謀團，此一措施延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但根據1944年之統計，擔任師長、軍長、軍團司令與集團軍總司令之將軍具參謀本部訓練者已在逐漸減少，

直接影響整個軍官團之素質^⑥。同時，軍隊將領的沉淪過程復由於內部分裂而變得加速，主要由於面臨新戰爭技術的考驗，以及1944年7月20日軍官謀刺希特勒未成所造成的後果。如果以真正參與謀刺的人數，以及參與者所擔任職務的重要性而言，並不足以證明其與參謀本部有任何之直接關連，但所得到報復的嚴重性卻使其內部的凝聚力受到進一步的打擊^⑦。

德國總軍官團所發展出之意識形態分裂的情形，在無條件投降數週後，由將軍們對其捕獲人的反應可以表現出來。接替希特勒職位之海軍上將杜尼茲（Grossadmiral Karl Doenitz）就認為，聯軍企圖強迫德軍移走象徵國家尊嚴帶有納粹反萬十字標誌之軍鷹旗，有違國際法之一般慣例。在5月18日的一項備忘錄中建議，向聯軍總部提出嚴重之交涉，以便結束此項政策^⑧。但在另一方面，也有較合作之將軍，駐義大利之德軍C集團軍總司令威廷和夫將

註④：Edgar Graf von Matuschka, "Die Refoerderung in der Praxis, in Militaergeschiches Forschungsamt (以後簡稱MGFA), ed.,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s Offizierkorps (Stuttgart, 1962), pp.173-176.

註⑤：Volker Berghahn, "NSDAP und geistige Fuehrung der Wehrmacht 1939-1943," Vierteljahrshefte fuer Zeitgeschichte, 17 (1969), pp.17-71. Johannes Huetter, "Das Erster Jahr des deutsch-sowjetischen Kriegs in Dokumenten des Generals Gorthard Heinrici," Vierteljahrshefte fuer Zeitgeschichte 48 (2000), pp.345-346.

註⑥：NA (U. S. National Archives, 美國國家檔案館, RG 319 (Army Staff), Entry 155, Box 316, The German Army Staff, Unpublished study by British, Canadian and U. S. staff, April 1946, pp.97, 115.

註⑦：NA, RG165, Entry 179, Box 758, Bogislaw von Bonin, The Decline Influence and Unity of the General Staff, Final Interrogation Report No.29, p.2.

註⑧：Gerhard Foerster and Richard Lakowski, eds. 1945, Das Jahre der endgueltigen Niederlage der faschistischen Wehrmacht Dokumente. East Berlin, 1975, Dokumente 224, pp.411-413.

軍（Heinrich von Vietinghoff）就通知聯軍，他已下令其部隊，將國家社會主義最後的種子完全消除，並命令所屬的軍隊與單位必須面對戰敗的後果^⑨。然而，不論在德國尚握有實權的將軍所發展出的意識形態之稍微差別如何，這些不久全被忘卻，他們自己立即就成為戰勝國非納粹化與非軍事化的對象。

同盟國的非納粹化與非軍事化措施對德國軍人的影響

非軍事化是戰勝國對德國無條件投降後所採取政策的一種中心思想，包括不僅要有形的徹底拆除其戰爭工業，同時也包括諸如消滅，甚至全部廢除德國武裝力量，將戰爭罪犯繩之於法或加以應得懲處等，措施甚至達到宣稱要將普魯士的軍國主義連根剷除。這種非納粹化與非軍事化之思想根源早已在戰爭期間奠定，但具體之措施與準備工作則在1944年方有雛形之奠定，等到德國一旦戰敗與被占領後就可實施^⑩。

在一項給占領軍總司令的命令，美國總統於1945年5月11日的裁定中，指

明同盟國主要的目標，就是永遠阻止德國再對世界和平造成威脅，並進一步重述，完成此一目標的基本步驟，就是根除其所有形式的納粹主義與軍國主義，立即拘捕所有戰爭罪犯加以懲處，解除德國的戰爭工業與使其非軍事化，以便繼續控制該國發動戰爭的能力，以及最後準備重建其政治生態於民主的基礎上。在非軍事化的目標下，要求美國駐軍總司令確實解除德國武裝部隊的所有力量，包括半軍事化的單位亦必須儘速解散，其人員將予解甲歸鄉，嚴格管理。同時，同盟國管制委員會將宣布停止所有軍事單位與半軍事組織的運作，包括參謀本部、德國軍官團、後備軍團、軍事院校，以及所有可能幫助保持德國軍事傳統的有關機構^⑪。

就在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幾乎同時，希特勒的將領們立即採取相當配合西方盟國的非納粹化與非軍事化的政策。同盟國管制委員會在1945年後半期，經過一連串的法律與公告，展開執行其非納粹化與非軍事化的政策。德國軍事法庭與戰地法庭停止運作，原有防衛軍（Wehrmacht）軍官所具有之執

註⑨：Public Record Office, (以後極簡稱PRO), WO 204/406, High Command Army Group C, von Vietinghoff to unnamed Allied commander, May 23, 1945.

註⑩：Gerhard Wettig：Entmilitarisierung und Wiederbewaffnung in Deutschland 1943-1955（Munich, 1961），pp.23-27.

註⑪：UMI/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II：1946-1953.Europe and NATO, microfilm。Frederick, Maryland, 1950, reel I, 0660-0674,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Directive, Revision of Directive to C-in-C. of U. S. Forces of Occupation Regarding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Germany, 20. 9. 1945, received version of Directive of April 26, 1945.

法權力亦告宣布解除^⑫。1945年9月17日宣布禁止穿戴軍事勳章、徽章、代表軍階之佩章以及具有軍事意義之任何標記。同時，也命令德國官員採取主動，執行原有的軍服改裝與改色，並收集與分配給無適當衣服穿著之人民或其軍服無法做適當改裝與改色之前軍人^⑬。1945年12月1日生效之管制委員會第8號法令，禁止任何組織團體或個人講授戰爭的理論與原則，並廢除所有有助於發展德國軍事傳統之軍事院校及退伍軍人組織。同時，亦規定任何穿戴納粹或軍種制服，及佩帶勳章為非法，軍事與民間遊行亦在取締之列^⑭。此外，法令亦宣布戰爭紀念活動、軍事博物館、圖書館之軍事書籍與刊物，甚至軍事地區之地圖，均被勒令關閉或停止運用^⑮。

同盟國對德國軍事將領與高階層軍官存有深度的懷疑與敵視，導致對彼等想出管制與監視之念頭。美國駐德國之軍事政府於1946年春季做出初步之決定，將德國軍人的名單分別造冊，並送交給設在法蘭克福城（Frankfurt）之美軍總部列管。主要的分類依其地位（軍階）或過去擔任職務的重要性分為：一所有陸軍將軍及海軍少將以上的軍官；二所有擔任過師長級或類似職務的軍官；三所有軍級之參謀軍官及空軍軍官；四所有武裝部隊其他級之軍官。軍事政府在備忘錄中強調，此類訊息（名單）被盟國軍事管制委員會的美國代表做為評估工作之重點及為提供管制措施之參考^⑯。除此之外，雖然正在努力試圖加速釋放低階層之戰俘，武裝部

註⑫：Georg Meyer, "Die Entmilitarisierung in der amerikanischen, britischen und franzoesischen Besatzungszone sow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45 bis 1950," in A. Fischer et al., Entmilitarisierung und Aufruestung in Mitteleuropa 1945-1956 (Bonn/Herford, 1983), pp.11-36. Gerhard Wettig, Entmilitarisierung und Wiederbewaffnung in Deutschland 1943-1955, Internationale Auseinandersetzungen von die Rolle der Deutschen in Europa (Munich, 1967), pp.102-121, 140-165.

註⑬：Military Government-Germany, U. S. Zone, Ordinance No. 4, Prohibition of Wearing Germany Military Uniforms (I, IV, VI to come into effect 17. 9. 45, II, III on L. 12.45), reproduced in R. Henken, ed. Sammlung der vom Allierten Kontrollrat und der Amerikanischen Militaerregierung erlassenen Proklamationen Gesetze Verordnungen, Befehle (Stuttgrt, n. d.).

註⑭：Control Council Law No. 8, Elimination and Prohibition of Military Training, November 30, 1945, reproduced in Beate Ruhm von Oppen (ed.), Documents on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 1945-1854 (London, 1955), pp.90-94.

註⑮：Wettig, Entmilitarisierung, pp.104-105.

註⑯：Institut fur Zeitgeschichte (以後簡稱IfZ), Office of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後簡稱OMGUS), 45-46/93/2 AG, Office of the Deputy Military Governor, OMGUS to HQ, U. S. Forces European Theater, March I, 1946.

隊的其他人員也在陸續加速被釋放中，但有些不久又以戰爭罪犯及負責安全的嫌疑犯及志願擔任逮捕（猶太人）工作者加以重新逮捕。當然，也有些更具有意義者與擔任更高職務者不在此名單中，特別是各軍種（陸、海、空軍）總司令與參謀總長，最高統帥（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或簡稱OKW）作戰處長、參謀總長及與陸、海、空軍總司令地位相當的野戰軍或集團軍總司令及參謀本部軍官團之成員等¹⁷。

從被俘將軍的觀點而言，最具有警訊的立法之一就是同盟國占領軍於1946年3月通過的國家社會主義與軍國主義解放令（Decre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National Socialism and Militarism）。此令使仍在英國做俘虜的赫因利希上將（Generaloberst Gotthard Heinrici）憂慮，寫信給在倫敦的戰爭部，除涉及在該國俘虜營之問題外，並提及上述之法令第6條的規定：所有參謀本部的軍官在1935年2月4日，由威瑪共和時代的國防軍（Reichswehr）改為希特勒的防衛軍（Wehrmacht）後，屬最高統帥部的武裝部隊，陸、海、空軍（OKW，

OKH=Oberkommando des Heeres，OKM=Oberkommandor der Marine，OKL= Oberkommando der Luftwaffe）總司令部的軍人即認為有罪，除非有證據證明相反。同時法令中的第10條亦規定，所有將軍級的軍官只要是在1936年6月1日以後晉升者，即被控以為軍國主義服務的罪名。赫因利希警告，此項對缺席將軍指控的危險性，並寫到就像其他案例，目前很多將軍的住處與地址可能無法知曉，因此也就存在一種危險，對彼等判決之詳情與內容無法送達，因此也就無法使其表達意見或為其辯護。最後赫氏在其結論中提議，應商洽美國軍事政府干預，使戰俘營之信件管制規章放鬆，如此可使仍為俘虜的將軍，得有機會寫信及對其被控訴的案件辯護，或不致被起訴¹⁸。

1946年8月管理德國非軍事化最重要的一項法律生效，此即是正式解散希特勒防衛軍的管制會議第34號法。事實上，此也是確認自1945年9月盟國政策早已訂定的明確目標：解散最高統帥部、陸軍總部、空軍總部、航空部、參謀本部、後備軍官團、軍事院校、退伍軍人組織的一項法源之追認。第2款特別指明任何維持、取代或重建上述之機

註¹⁷：IfZ, OMGUS, 45-46/93/2 AG, RESTRICTED, HQ, US Forces, European Theater, Disbandment Directive NO. 8, February 16, 1946, [Signed] Brig. Gen.L. S. Ostrander. 在重新將戰俘分類成解除武裝之敵人武力，然後可解除其對日內瓦戰俘公約的義務，見Richard D. Wigg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nial of Prisoner of War (POW) Status at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Militae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以後簡稱MGM) 1/1993, pp.91-104.

註¹⁸：IfZ, OMGUS 15/123-2/3, Copy, Generaloberst Heinrici to the War Office [POW] Camp II, May 7, 1946, SUBJECT：Decre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National Socialism and Militarism.

構或組織均應予禁止或被列為非法。第3款宣布所有有關武裝部隊之立法及軍事犯罪懲罰條列，軍人、退伍軍人、相關軍事組織人員及其家屬之法律地位與權利章程均予廢除¹⁹。

事實上，第3款亦包括廢除所有軍事人員退休福利，包括遺族的撫卹金。此款到1947年底方被美國駐德軍事政府辦公室發現有漏洞，做及時的補救及修正。一位美國軍方官員發現，問題涉及到善加處理德國軍人福利，及身後照顧有助於軍事政府政策之推行，特別是德國非軍事化及民主制度的建立。故目前應予避免的是，不要讓死難與憎恨形成一個有力的團體，對培育出的民主體制造成傷害²⁰。

至於處理將軍與其他高級軍官的情形，英國人相較其盟友美軍，則顯出較多的不妥協。在1946年中旬英國占領區當局已經完成編列其管區內，或在其管轄下前德軍陸、海、空軍將領的名冊，包括在投降前已經退役者，並有完整之地址。在一封致美國占領當局立場強硬，並著重重點及嚴肅指責的函件中強調，四國（英、美、法、俄）協定並

未達成對德國武裝部隊人員再分類之協議，英國占領區也未採取行動再分類或釋放任何此類高階軍官。英國官員顯然很憤怒地指出，美國占領區內有前德國陸軍將領與海軍將軍被重新分類與被釋放，需要美國當局解釋此事²¹。但在柏林的美軍總部辦公室回答稱，確有大約12位被釋放的前德國高階層軍官是由於身體與精神情況所致²²，可是英國當局對此項釋放仍然表示不同意的態度。

戰俘營的經驗

如果暫時拋開個人與意識形態的緊張情勢不談，尚有三個因素促成戰俘營的經驗，對德國重整武裝具有特別意義。首先，英國與美國當局決定，將在俘虜營的陸軍將領、海軍將軍與參謀軍官集中，與其他戰俘分開，因此，達到一種非預想到的結果。蓋有些將軍或參謀軍官以前並未有機會相識或交換過意見，現已事過境遷，可以在一起自由討論過去的失敗原因或是非曲直。同時，稍後西方占領區合組成的西德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國防計畫室或稱布倫克辦公室（Blank Office或Blankstelle）也常

註¹⁹：Public Record Office（以後簡稱PRO），（British）Foreign Office（以後簡稱FO）371/55480, Allied Control Authority, Control Council Law No, 34, Dissolution of the Wehrmacht, August 20, 1946.

註²⁰：IfZ, OMGUS 2/99-1/6 ACA, Leo R. Werts（Director, Manpower Division）to Deputy Military Governor（OMGUS），December, 24, 1947.

註²¹：IfZ, OMGUS, USGCC, 44-45 6/10, Chief Secretary, Office of Deputy Military Governor, CC for Germany, Berlin, to OMGUS, US HQ, Berlin, June 1, 1946.

註²²：IfZ, OMGUS USGCC, 44-45 6/10, Major General Robert W. Harper, OMGUS Armed Forces Division, to Secretariat, Advanccd HQ, Control Commission（BE），June 5, 1946.

派人與之接觸及聯絡，取得甚多的建軍經驗²³。再者這些集體經驗稍後涉及到西德重整軍備辯論的主要泉源，幾乎完全來自西方盟國所管轄的一個俘虜營。即使俄國釋放被俘的將軍後來也多數參加自由德國國家委員會（National Komitee Freis Deutschland，NKFD），也有些後來在東德人民武裝警察（Kasernierte Volkspolizei，KVP）擔任重要的職務，也有幾位將軍自俄國俘虜營釋放後，參加後來西德聯邦的軍隊（Bundeswehr）。希特勒時代在大戰初期的陸軍參謀總長哈德爾將軍（Franz Halder）曾在1950年代中期指出，俄國人儘可能的拘留幹練的被俘德國將軍，直至最後可能的時刻才釋放²⁴。最後，將軍們在俘虜營期間象徵重整軍備討論的開始，蓋失敗的經驗只有在此種地方才有機會具體地交換意見，為新時代的建軍找出一些可循的道路或基礎，正好此時又遇上冷戰與美、蘇兩大集團的對立剛剛開始後不久。

戰敗軍人的心理狀態及為自身的辯護

但在如此強烈的身體與心理壓力之煎熬下，及面對國家戰敗及被戰勝國羞辱的陰影中，有些俘虜營內之將軍們內部的團結與意見漸趨分散，較以往，尤以較在戰時，變得更為明顯。同志的精神早已不復存在，常為細故爭吵。在紐崙堡審判時更採用種種方式為自身辯白，推卸與納粹黨的關係，及在戰時所應負的責任或犯下的罪行²⁵。許多例子無法在此一一例舉，但其中有一例值得一提。夏克中將（Friederich Schack）告訴俘虜營訊問官說：「師長級的軍官直到最後時刻，很少被告知戰局的真相，以致對有些突然來臨的惡劣情勢多不知如何事先預防或處理，所以他的老套話是「微小」級之師部司令官（Kleines divisions Kommandeur）。另一位將軍狄特利區（Sepp Dietrich）對盟軍訊問官談及有關德國對外政策時的評語是：「對防衛軍從元帥至伍長而言，完全是一種哀悼曲，我們與此毫無關連²⁶」。這些話雖不見得完全正確，但至少也代表軍人對納粹黨專制政權的一種極強反感。

甚多軍人否認參與第三帝國的政治

註²³：Ulrich de Maiziere, In der Pflicht eines deutschen Soldaten im 20. Jahrhundert, Hertford, 1989, p.129.

註²⁴：Bundesarchiv-Militaerarchiv, Freiburg i. Br.（以後簡稱BA-MA），N601/43, Halder to Genlt. a. D.Arthur Schmidt, July 6, 1956.

註²⁵：M. Fretter-pico, Die Jahre danach（Osnabrueck, 1986），pp.16-18, Erich Hampe, ---als alles in Scherben fiel（Osnabrueck, 1979），p.133.

註²⁶：Liddell Hart Center for Military Archives（以後簡稱 LMCMA），Liddell Hart Papers（以後簡稱 LPP）9/24/98, Oberstgruppenfuehrer Joseph "Sepp" Dietrich, Commander 1 SS Panzer Corps & 6 SS Panzer Army, n. d.,p.9.

與罪犯行為，首由1945年開始的紐崙堡軍事審判戰犯法庭之刺激而加強。絕大多數的將軍做集體的努力為自身與參謀本部辯護。一份命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防衛軍軍官團」（The Officer Corps of the Wehrmacht in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te）的備忘錄於1945年6月22日，由拘留在第33號俘虜營的數十位將軍連署而呈。在共8頁的聲明書中指明，自從1933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後，年輕的軍官比較歡迎納粹黨，但年長者並非如此。文中首先一段的結論強調，由於戰爭所帶來的困難，甚多優秀與年長的軍官由於軍人本職及愛國精神抑制了他們的批評。在文件的其餘部分，可值得一提的是將軍們在紐崙堡法庭的供詞、回憶錄及其他歷史著作所常提及者相類似，此即是軍官由於對希特勒所做的誓言之困束。後者又常不理會前者從職業觀點所做的建議，高級軍事領袖雖不信任元首，但由於蓋世太保（納粹時代的德國秘密警察）的嚴密監視，也不能有所作為²⁷。

這些說詞顯然是為自身辯護及逃避

所應負的責任。如果希特勒沒有參謀本部及將軍們的協助或通力合作，根本就沒有能力發動戰爭。雖然很難將這些將軍全部定罪，但他們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譴責，只會進一步激怒聯軍官員及加強他們原先的態度及認定。

紐崙堡的審判及與美軍合作撰寫歷史

當紐崙堡審判第一批的戰犯，在1946年罪狀宣布後，被困在戰俘營絕大多數將軍的反應是極端的憤怒、恐懼，以及普遍的感覺是成為戰勝者單方面正義及不公正的結果之犧牲品，尤以對約德爾將軍（最高統帥部之作戰處處長）的死刑判決更是覺得無法接受，認為是所有審判中最不能令人心服的²⁸。稍後陸續的審判很多被關在俘虜營的將軍被迫成為調查的對象或證人²⁹。此類作證使其中大多數的軍人，熟知如何運用各種爭論去防衛過去自身的行動。但較廣與較大寫作的目標當然也是為其職業及自身的榮譽而辯護，不過卻也導致若干在歷史上驚人的曲解³⁰。

註²⁷：BA-MA, N 419/11, Das Offizierkorps der Wehrmacht i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PWC no. 31, den 22 Juni 1945, pp.1-7.

註²⁸：MGFA, Meyer Befragungen, 此為19卷由麥耶（Dr. Georg Meyer）與前德國軍官與將軍在1976年與1980年間談話的紀錄，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有一份複製品，p.7.

註²⁹：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10 (Nuernberg October 1946-April 1949), vol. X, "The High Command Case" (Washington, D. C., 1951), and vol. XI, "The High Command Case I: The Hostage Case" (Washington, D. C., 1950).

註³⁰：LHCMH, LH 9/24/110, Generaloberst Heinci to Liddell Hart, May 4, 1948.就是其中之一例。

雖然，有不同的訊問，及將軍們艱辛地企圖與第三帝國劃清界限，但對戰俘經驗也有另一種刺激力量證明是非常有意義：歷史寫作。然而，當時許多將軍都很想將他們涉及在軍事與政治領域所想與所得訴諸於文字，但當時的環境是非常惡劣的，並不適宜寫作，尤以在英國北部之格利茲達廳（Grizedale Hall）的一個戰俘營。利特爾將軍（General der Panzertruppen Wilhelm Ritter von Thoma）就曾抱怨在其俘虜營內，將軍們擁擠在一起，不可能有隱私或安靜的處所可以從事寫作的工作，同時，也沒有足夠的傢俱可以讓他們舒適地工作。何況，更沒有相關的書籍，整個環境都是相當的不利，雖然他們很有心意將所遭遇的寫出來³¹。事實上，英國官方並不強烈鼓勵寫這一類軍事歷史，以及軍事技術的報告與研究，可能是恐懼會暴露自身的弱點與準備不足之窘境，故在1940年會戰敗。美國就沒有這種窘境，故其陸軍部歷史局於1946年與47年在德國占領區內推動利用戰俘營內相當數目的將軍從事軍事歷史的寫作計畫，英國當局也相當配合³²。

1946年1月，美國陸軍歷史局已建立德國戰史組，6月已雇用328名軍官，絕大多數是將軍。同時，亦在該年6月，此項位於法蘭克福城附近的歐勃魯塞爾戰俘營（Oberusel）的工作，轉移至位於碼爾堡（Marburg）附近之阿倫道夫供應站（Allendorf Lager）。1947年5月，第二組人員又加入工作，並且移至附近新城（Neustadt）之俘虜營，導致更大與混合之組合。1948年6月30日，正式關閉在新城的俘虜營，並不意味著此項歷史研究計畫的結束，蓋（德國）戰史組在管制團（Control Group）的名義下一直存活到1961年。此一早期美、德合作之例的意義有兩方面。首先，此種利用被俘的德國將軍從事經由過去戰爭事件回顧之著述工作，可幫助他們發展寫作技巧，為日後出版各自的回憶錄，撰寫備忘錄及在報紙發表論文有甚多之益處。再者，此也導致不僅讓美國資助的機構，在日後武裝的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角色，也使其可提供給美國軍官與前德國軍人一種非正式管道交換，在建軍的意見與問題解決之道。一位前德國將軍回憶時稱，重建德國武裝部隊的首要指

註³¹：LHCMH, LH9/24/114, B. H. L. H. Notes for History, (2nd) Talk with General von Thomas, November 20, 1945, p.3.

註³²：Karlheinz Hoefner, Die Aufruestung Westdeutschlands. Willensbildung, Entscheidungsprozesse und Spielbaeume Westdeutscher Politik 1945 bis 1950 (Munich, 1990), pp.159-163, Charles Burdick, "Vom Schwer zur Feder Deutsche Kriegsgefangene im Dienst der Vorbereitung der amerikanischen Kriegsgeschichtsschreibung ueber Zweiten Weltkrieg. Die organisatorische Entwicklungen der Operational History (German) Section, " Militae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以後簡稱MGM), 2/1971, pp.69-80.

示器，是來自美國方面，特別是阿倫道夫俘虜營³³。

將軍被釋放後的處境

在1947年底，大部分被俘的將軍已從英、美與法國俘虜營中被釋放。根據一位將軍在次年（48年）2月初的報導，在新城的俘虜營只有50位左右，看起來似乎是長久居住者³⁴。除了那些被判刑者或等待戰爭罪犯審判外，1948年剩下來被拘禁的戰俘也都陸續被釋放或被遣返。但成為西方國家手中的俘虜，與東線被蘇俄所俘者幾乎相似，對許多人而言，都有不能忘卻的創傷或惡夢。在某種意義上講，此是戰爭的自然結果，也是屬於軍人這種職業不能避免的危險。然而，釋放意味階級森嚴的軍事結構最後之解體，此（直到解體時）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被德國戰俘自身間所極端敬重，雖然大多數將軍已在被俘期間不擔任實際之軍事職務或已經退伍³⁵。

自戰俘營被釋放的將軍，亦意味在一個戰敗與被占領的國家面對立即與痛苦生命的現實與挑戰。戰時所受的創傷，監禁中所受的心理或精神壓力，以及沒有學習到謀生技能之基本與酷苦的事實，使多數退伍軍人在戰敗後的殘破德國，尋求職業更加困難，尤以對較年長的將軍必須要在艱辛的勞力工作與失業間做一選擇³⁶。除掉掙扎如何在破碎國家的廢墟中力求生存及支援家庭外，他們尚須遭受被戰勝國占領當局分類成為安全嫌疑犯的危險。將軍在所有前納粹政府官員中，更容易被前同盟國情報軍官注意或監視。檢查手段包括偷聽往來的電話談話內容，攔截與秘密閱讀，親友之通訊來往函件。此類的監視執行得毫無目的與有些凌亂，但觀察注意力以及集中有安全嫌疑人的活動與談話情形，使其對於占領當局具有特別的興趣³⁷。

由於懷疑的氣氛，大多數將軍在1948年的通訊雖然也提到與法國和解

註³³：IfZ, ED 91/44, Leo Geyr Frhr von Schweppenburg, Vom Neubau der deutschen Bundeswehr, n. d., p.1.

註³⁴：LHCMA, LH 9/24/53, Blumentritt to Liddell Hart, February 6, 1948.

註³⁵：例如大戰初期之德國陸軍總司令布勞齊區元帥（Walter von Brauchitsch）在1946年中旬寫給其妻的信中曾表示，他是在服務軍旅46年後，被一位美國中尉強迫自軍中退休，感到非常憤怒。按布氏在1941年底因莫斯科戰役問題，與希特勒發生爭執而離職，但仍保持元帥頭銜及待遇。見 IfZ ZS19, folder 6, Brauchitsch to Charlotte V Brauchitsch, June 2, 1946.

註³⁶：將軍們在戰後為尋找工作、住所及為克服對軍人產生的偏見所遭遇的問題，見Siegfried Westphal Erinnerungen. Mainz, 1975, pp.387-340.另有位少將在戰時失去一隻腳，在俘虜營被釋放後，僅能做一些粗工糊口，見BA-MA, MSg. 118/4, Generalmajor a. D. Karl Wagner, Kurzschilderung, November 21, 1955.

註³⁷：有關盟國占領當局所採取的各種監視措施，見Hoefner, Die Aufruestung Westdeutschlands, pp.42-56.

對德國復原或恢復的重要性以及蘇俄的軍事威脅，但卻有意地避免討論，或甚至提到建立德國的武力以防衛西歐³⁸。然而，也就在那一年，有些將軍開始考慮到來自東方的威脅，及德國可能採取的防衛措施³⁹。然而，在許多場合威脅的評估，與相信需要德國軍事武力形成時常緊密的聯繫在一起，以致幾乎不可能將其彼此分開。

戰後德國將軍與共同防衛歐洲思想的形成

當若干將軍在俘虜營研究武器技術與戰術發展時，亦有人會聯想或牽涉到未來需要德國武裝力量以相對應的問題。很明顯地，此一問題不可能訴諸於任何形式，以免引起營內盟國軍事官員的猜疑。同時，國際局勢直到1947年底並未演變得很清楚，足以給將軍們任何明確的工作基礎，英、美當局也未做公開的表明，需要額外的武裝力量。然而，有若干根據使前德國軍

人相信，一個軍事分遣隊伍應該很快地能夠建立起來，蓋在西方占領區內已有一支軍事服務團（Dienstgruppen）由英、美兩國占領軍雇用，從事像清理礦場與卡車駕駛等工作⁴⁰。正如一位德國軍史學者所指出，前各軍種與兵種的資深軍官，於1948與49年在各種私人會議、通訊與備忘錄中試圖提出對西德安全的戰略與操作上的意見⁴¹。但此僅是比較容易聯絡的將軍之小團體，有助於前軍官的看法轉送給政治家、民眾與急於求取資訊的美軍情報軍官。

在這些將軍中，特別是後來在研究西德面臨之軍事問題明確輪廓而變成為較重要人物的有：蓋爾將軍（General der Panzertruppe a.D. Baron Leo Geyr von Schweppenburg）、史派德中將（Hans Speidel）以及曼都斐爾將軍（Hasso von Manteuffel）等。此三人，均在戰後德國初期建軍工作方面扮演關鍵的角色，起初也合作得很好，尤

註³⁸：LHCMH, LH 9/24/51, von Bechtolsheim to Liddell Hart, June 6 1948.

註³⁹：例如哈德爾就向一位法國的新聞記者解釋稱，萊茵河將可能是西歐最後的防線，見 Franz Halder, "Halder als strategisches Orakel," Schwaebische Landeszeitung, November 19, 1948.

註⁴⁰：有關軍事服務團的組成與活動，見 H. L. Borgert, "Zur Entstehung,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der Dienstgruppen in der britischen und amerikanischen Besatzungszone Westdeutschlands 1945-1950," in Heinz-Ludger Borgert, Walter Stuermer, und Norbert Wiggershaus, Dienstgruppen und Westdeutscher Verteidigungsbeitrag, Alternative Ueberlegungen zur Bewaffn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oppard am Rhein, 1973, pp.91-97.

註⁴¹：Roland G. Forster, "Innenpolitische Aspekte der Sicherheit Westdeutschlands 1947-1950," in MGFA, ed. Anfaenge Westdeutscher Sicherheitsheit 1945-1956（以後簡稱（AWS）（Munich, 1982, 1990, 1993, 1997）（4冊），vol. 1, pp. 405-417.

以蓋爾與史派德在1948年與49年緊密地在一起工作，但後來在若干問題上變得針鋒相對直至1960年代。

1948年中旬，蓋爾及史派德與德國和平問題委員會（Deutsches Buero fuer Friedensfragen）建立聯繫，此為一個設在斯圖加（Stuttgart），有核心幹部的組織，為盟國占領當局所容忍，雖然有意為未來的德國外交部立下基礎或鋪路。此組織的一位雇員，福斯特博士（Dirk Forster）在1948年協助建立蓋爾與史派德間的會議，並支付150馬克給後兩者撰寫備忘錄，並在年終交稿給委員會^⑫。蓋爾的第一份備忘錄首先提出一連串的問題，其中最重要之點是，問美國是否會把德國當作主要戰場及軍隊如何組成等。此類問題如無答案，似乎是很難做進一步的合作討論。蓋爾在最後部分的結論，特別提出戰略——軍事情勢需要德國提出必要的防衛貢獻^⑬。

1948年，史派德的第一份給德國和平問題委員會的備忘錄，命名為「西歐的安全」，較蓋爾的建議更切合實際，雖然也採取細心的探討問題。他對戰略的議題有較正確的分析，認為未來美、蘇的衝突主要的戰場雖在地中海與

中東，但歐洲本部的防衛問題也不能忽略。德國是未來俄軍主攻的側翼，其中第一條進攻路線也有可能經由德、奧與瑞士向西南直趨大西洋岸與庇里牛斯山（Pyrenees）。因此史氏的結論是德國與其他歐洲國家的防衛應聯合在一起。他雖未正面提出德國應如何協助歐洲整體的防衛，但也引述一位美國記者的論述，歐洲的安全不能沒有德國的協助^⑭。另一點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盟國準備以萊茵河為主要防線，放棄其他部分的領土，史派德認為，有必要加強防衛德國的邊界或安全組織，設立聯合指揮部，應有20個坦克師及建立空軍基地等^⑮。

1948年末與1949年初，蓋爾與史派德繼續在軍事問題向和平發展委員會建議，主要的動機在於蘇俄的威脅及其部隊在東歐的集結。1948年底艾丹諾（Konrad Adenauer）接見史派德討論未來的防衛問題。前者此時尚未擔任德國總理，僅是基督民主聯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在英國占領區的領導人物。稍後（12月中旬）史氏也致送給艾氏一份備忘錄^⑯。此時正是蘇俄封鎖西柏林之對外交通，西方盟國以空運方式對抗之際，軍事衝突的

註⑫：IfZ, ED 134/19, September 9, 1948, ED 134/20, Forster to Speidel, July 23 & August 10, 1948.

註⑬：IfZ, ED134/19, Anlagen zur IV 2662 von Baron von Geyr, n. d.Hans Speidel, Aus unserer Zeit.Erinnerungen（Berlin, 1977）, p.466.

註⑭：備忘錄的摘要見Speidel, Erinnerungen, pp.454-456.原稿存於IfZ, ED 134/20，正確日期是June 5, 1948.

註⑮："Ergaenzung zu den Bemerkung---", in Speidel, Erinnerungen, pp.466~467.

註⑯：Speidel, Erinerungen, pp.252-254.

可能性有升高之趨勢。未來德國將擔當俄國向西侵略之首站，防衛之加強較以前致送給和平發展委員會的建議更覺得有迫切性⁴⁷。

蓋爾同樣地對蘇俄突然攻擊的危險性，以癱瘓脆弱的自由歐洲防衛給予嚴重的警告。他在1949年3月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俄國軍隊以裝甲與空降武力可能在48小時內到達萊茵河的可能性⁴⁸。在蓋爾與史派德進一步的備忘錄中，前進防衛的觀念明示與暗示地被提出，組成德國師的想法亦在此時顯露⁴⁹。雖然蓋爾與史派德在1948年至49年的活動，以及和平發展委員會的工作，已使若干德國政治家注意到殘破德國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後者也開始體認到他們無法不尊重過去為軍國主義效命將軍專業之意見⁵⁰。

曼都斐爾在1947年從聯軍俘虜營被釋放後，就開始對軍事問題提出若干

新思維，撰寫裝甲戰術所出現問題之備忘錄及未來陸地戰爭之武器與組織等，在1948年末首次與艾丹諾會面，又在1949年初再度會談⁵¹。未來的德國總理似乎對於建立某種形式的安全武力感到特別有興趣，對於這兩次的討論，曼氏在1948年3月致送艾氏一份備忘錄，文中特別體認到共產主義對歐洲普遍的威脅，不但促使數百年的法、德間之世仇漸告結束，亦使中、西歐國家較在歷史任何時期更為團結⁵²。同時，曼氏在備忘錄中特別讚揚德國軍人在過去的英勇表現，未來防衛新歐洲亦為不可或缺的角色。他特別強調防衛西歐，德國不應完全依賴其過去的敵人與現今的占領國，而應有自己的角色與力量。如此過去德國軍人的地位就顯得很突出⁵³。

雖然曼氏所提的軍事問題並非很直接，但也可以看出他對當前國際對立的

註⁴⁷：同前註，pp.468-471.

註⁴⁸：IfZ, ED 134/19, Gedanken ueber Neutralisierung Gesamt-Deutschland, Irschenhausen, den 31-3-1949.

註⁴⁹：OM IfZ, ED 134/19, Geyr von Schweppenburg, memo., September 7, 1949, "Gedanken zur Sicherung Westeuropas Bezug : Die Sicherheit Westeuropas vom Juni 48, Gedanken zur Sicherung Westeuropa vom 15. 12. 48, " April 5, 1949, 記錄在 Speidel, Erinnerungen, pp.472-476.

註⁵⁰：與蓋爾及史派德接觸過的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有膠勒（Gerhard Mueller）與希米德（Carlos Schmid）他們以後還會有機會提及，見IfZ ZS 2460, Kh Hoefner, Befragung Praesident a. D. Prof. Dr Gebhard Mueller, April 15, 1987.

註⁵¹：Borgett, et. al., Dienstgruppen und Westdeutscher Verteidigungsbeitrag, p.17 ; BA-MA, N 617/18, Mantentffel to Adenauer, November 18, 1948.

註⁵²：MGFA Befragung Mantentffel von OTL, Foerster und Fischer, 12. 4. 1976.

註⁵³：於下頁。

情勢感到憂心，尤以德國所處的脆弱地位更是值得注意。例如，他認為西方盟國的聯合空中武力，不足以阻擋蘇俄陸軍向西的挺進，因此，只有地面上重裝甲部隊，配以最新的火力及訓練，將是最有效的防衛紅軍之攻勢⁵⁴。

西德在1949年第一次國家選舉後，新總理艾丹諾於9月23日，首次發表組織政府宣言，開始漸有發展屬於自身防衛武力的念頭，曼都斐爾於該年11月致送給艾氏一封長信，內容陳述代表大多數前職業軍人的見解。首先，曼氏表明德國在此戰後新衝突中不可能維持中立。萬一發生戰爭時，自由歐洲國家必須要足夠堅強抵禦俄國西進的能力，穩住陣腳至少要在半年以上，等待大量美國軍隊前來援助。愈快整合德國及加入北大西洋公約應是相當緊迫的問題，雖然前者（德）此時尚無權利組成軍隊。同時，曼氏也認為，輕裝德國未來的武力不具有任何的軍事意義，也無法擔當應負的重任。在結論部分，他主張新的德國軍隊組成應上至軍的單位，但主要的基礎是裝甲師與裝甲步兵師，配備最新式的武器，而且應有30個師的實力，並應建立戰術的

空軍與海軍以保衛領空與海岸⁵⁵。艾丹諾可能以為，此建軍問題相當複雜，非德國本身說做就可以做得到，尚須徵得前敵國，尤以法國的認可，故艾氏經由其外交政策顧問布蘭柯荷恩（Herbert Blankenhorn）向曼氏解釋困難之處⁵⁶。同時後者非如史派德之細心，故與新總理關係漸疏遠，也為曼氏工作招致甚多之困難，但其仍是前軍人集團為重整軍備，與西德國家安全辯論之重心人物。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在1949年5月23日正式成立，此時組成新國家之基本法已經生效。接著許多對前德國軍官的限制也陸續解除，但這不等於前三國占領區（英、美、法）完全放棄非納粹化活動與安全檢查。例如，第16號盟國管制法（Allied High Commission Law No.16 of December 16, 1949）確認稍早所制訂之直接或間接限制軍國主義、半軍事及軍事組織的活動⁵⁷。此時居住在西德之將軍對此新時代之來臨感到異常興奮，他們之中有很多人在從俘虜營被釋放後，因無退役金可領（原來之政府已被迫解散），只有做一些零星的勞工，

註⁵⁴：曼都斐爾在德國報紙Frankburger Tageszeitung 發表過一篇文章，強烈批評以萊茵河為防線的不當以及需要改變西方盟國家之防禦態度，全文見LHCMA, LH 9/24/72, Hasso von Manteuffel, Bekenntnis eines freimuetigen Deutschen, Im Maerz 1949.

註⁵⁵：LHCMA, LH 9/24/72, Manteuffel to Liddell Hart, April 25, 1949.

註⁵⁶：BA-MA, N 6/7/18, Manteuffel to Adenauer, November 18, 1949.

註⁵⁷：BA-MA, N 6/7/18, Blankenhorn to Manteuffel, December 6, 1949.

註⁵⁸：全部條文列在Beate Ruhm von Oppen, (ed.) Documents on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 1945-1954 (Berlin, 1984), pp.445-466.

以維持其本人與家庭的生計，但這工作的數量並不多。更由於他們的職業背景、年齡及與納粹黨之關係，使其蒙上助長侵略與戰爭暴行的惡名，有感到沒有受到公平待遇之苦⁵⁸。究竟有多少前希特勒時代的將軍，於1949年末生活在新成立的西德聯邦之國境內實在無法統計。依據稍後在艾丹諾政府負責軍事事務之希魏林（Count von Schwerin）在1950年10月估計，這些軍人大約有2,500人左右⁵⁹。總之，雖然他們的物質條件非常的惡劣，但至少居住在前西方國家占領區內之德國將軍於1948年～49年目睹德國西方防衛戰略的空虛及警覺蘇俄向西擴充的危險性⁶⁰。

結 論

德國處在歐洲大陸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周邊鄰國威脅及容易入侵，使其傳統上注重軍事，及軍國主義盛行。因此，軍隊的組織及戰鬥力均屬世界一流。即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戰勝國家對此點也不能完全忽略，而且後者在特殊的新環境中又欲加以利用。德國軍人雖在完全戰敗後，感受到極大的痛苦與茫然，但能夠在新時代中貢獻

其所長，是其在新環境中唯一的機會。而此次不像過去，是一種徹底的戰敗，不可能再恢復過去屬於他們階層的傳統與光榮，而必須在新時代扮演新角色，為新的社會盡一份力量。故他們也在等待1949年西德（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政府組成後，才能夠真正一顯身手前，目前只有儘量表達對時局與當時戰略的看法。

軍人在贏得戰爭勝利時，可以享受榮譽，但在戰敗時，則須忍受痛苦，這是歷史一種必然的現象。但如何在戰敗之後，痛定思痛，找出教訓，為未來開闢一條新的道路，為人類提供可貴的經驗，也應該是一種正面的貢獻。德國軍人在第二次大戰徹底地戰敗後，接受殘酷的事實，忍受痛苦，謀求如何生存及利用環境再圖站起。但這次他們並不想尋求一個復仇的戰爭，而是利用環境，與過去的敵人合作，共同促成區域更大的安全，但這已是1949年以後的事了。

收件：96年10月15日

第1次修正：96年11月29日

第2次修正：96年12月17日

接受：97年1月2日

註⁵⁸：BA-MA, MSg. 118/4, Genmajor a, D. von Geitner to Schramm, January 18, 1956, 另見Siegfried Westphal, Erinnerungen, Mainz, a. M., 1975, p.413.

註⁵⁹：Roger Bullen and M. E. Pelly, eds, Documents-III German Rearmament September-December 1950 (London, 1989), fiche 4, TOP SECRET. Note for Air Marshal Sir William Elliot on visit to Germany, 7th-15 October, 1950.

註⁶⁰：LHCMA, LH 9/24/51, vom Bechtolsheim to Liddell Hart, June 6, 1948, LH 9/24/64, Heinrich to Liddell Hart, December 10, 1948.